

钩沉

你不知道的另一支“731”

观影

更喜「黄花」分外香

迟超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去年11月上旬在全国公映，今年在各个网络平台影院上线播出，新生代导演处女作、中小成本新四军抗战电影《黄花塘往事》，选题大胆细心、切入点有新意、场景恢宏震撼、情节跌宕起伏、画面赏心悦目，如画卷徐徐展开，似故事娓娓道来，值得细细品味，令人久久回味。

这是一部讲担当的作品。新四军是抗战重要力量。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了领导指挥机构。1943年至1945年，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地区驻扎两年零八个月，内部代号“黄河大队”。就是在这里，陈毅、张云逸等新四军首长坐镇指挥下属各路部队，在中国南方的广大敌后战场上接连重创日寇伪军，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苏皖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电影《黄花塘往事》根据这段历史背景，选取当时有代表性的几个真实事件原型，如根据地爆发疟疾、新四军战地医疗、军民合力营救落难飞行员等，以现代青年小革寻找奶奶的初恋为引子，讲述了来自上海名门闺秀林清莲投奔新四军，与当地民兵李长胜在战场上相遇，又因战争最终分离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这是一部传承弘扬新四军抗日将士“铁军”光荣的优秀作品，也是一部少有的展现新四军医护工作者“红医”精神的拓荒佳作。时至当下，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可谓不少，但新四军题材抗战影视作品为数不多也是事实。电影《黄花塘往事》于秦皇白浅处飞针走线，是对红色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锦上添花，更是对新四军题材抗战影视作品的填补式贡献。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国强军重任，这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我军军史史实资源进行全面深入挖掘的作为，自可见一份见识胆识、责任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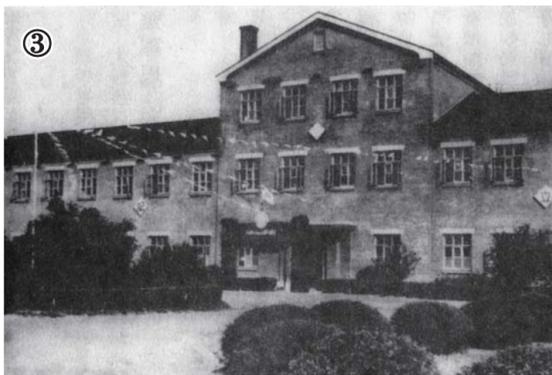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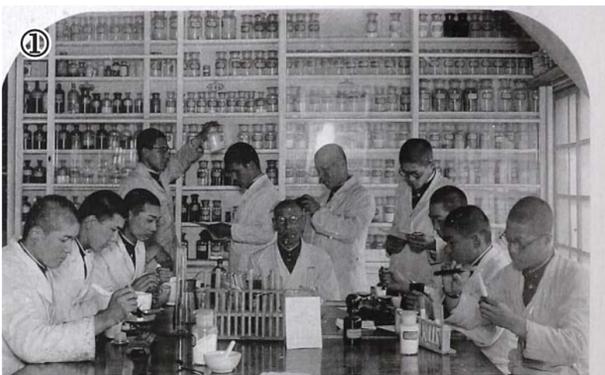
1945年1月21日，一架支援我军抗日的美军战斗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救助伤员时军医林清莲由于刚来到部队战斗经验不足，擅自为美国飞行员火线包扎，结果被炮火震晕，执行任务的民兵李长胜将其救起，于是开始了那一段美丽的邂逅。这样的开篇平淡、温暖，充满了人情味。接下来故事的铺陈与展开，让我们领略到战火硝烟的间隙也可以有炊烟袅袅、生机盎然。

在军民备战、组织生产过程中，这对青年男女逐渐了解、靠近、相知、相恋，期间也有对彼此的误解，甚至男主人公会吃醋自卑自责，而这一切都在还原英雄“本真”。男主人公的父亲开始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样“英雄”，他千方百计阻挠儿子参军，这让观众十分困惑不解。直到这位父亲对着家里供奉的两套军装说话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已为国家痛失两个儿子。而当他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到部队时，这名英雄父亲的伟大之处便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动落泪。这些平日看似与我们无异的“小人物”，都在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背景下完美地履行了各自的使命，实现了“小人物”的飞跃与升华。

这样创作的初衷，说到底来自对“人民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英雄”的深刻认识，来自对坚持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科学把握，来自对真情实感的精准掌控。从而使作品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更具穿透时空的传播力、感染力，让历史照进现实、照进人心，让人们走近历史、走近英雄，通过银幕与70多年前的抗战先烈们完成了一次“隔空对话”：国家越来越强大的背后，是革命前辈奉献自己的青春在绝境中探索出来的一条复兴之路，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渴望平静、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一代人，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家存亡之时，他们具有“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的风骨与气度，把对未来越好憧憬与期盼，化作燃烧自己激情与生命的行动。

电影《黄花塘往事》是由青年新锐导演罗媛执导的。作为中国内地新生代导演，她与创作团队以创新的视角、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手法，全维度展现了“战地黄花”的美丽与芬芳。残酷的战争，清新的初恋，影片在家国、爱与恨、己与他中，尽最大可能去达成历史事实与故事叙述、真实人物与剧情人物、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统一，做到既尊重革命历史、再现革命历史，又遵循艺术规律、凸显艺术特质，把崇高宏大的革命精神转化成为“接地气”的文艺形象。包括在一群生动鲜活的人物角色选取和呈现上，长大了的有着八块腹肌的“嘎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老革命“陈岩石”，以及一个个默默用生命无私耕耘奉献的黄花塘人民群众，无不“微雕”刻画，于恢宏与细腻间，把他们的纯朴善良、爱憎分明、英勇无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观影人群中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父辈都是新四军老革命。观众吕大海含泪讲道：“我的父亲曾在新四军三师九旅战斗，那时我虽然年幼，但儿时的记忆与电影中展现的历史画面非常相近，观影中我多次落泪，致敬父辈们的英勇与伟大！”观众冷莎莎的父亲曾担任新四军某部排长，得知这部影片的导演罗媛是90后，她感慨地说：“真是有心了，用心了！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国家的年轻人还能关注那些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这本身就是一次穿越历史的英雄青年聚会。”

罗媛也曾有过一段话：“一代人丢下的，几代人都未必拾得起来。我就是要拍一部能够让让人静下心来去看去回味的电影。”一个人用心，成就一件事；一代人用心，成就一个时代。正是因为用心，电影《黄花塘往事》给人以身穿透雾、走出局限的指引，带来的震撼力是发自内心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而是对灵魂的一次净化和升华。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庭上多名战犯供认了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制与量产，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揭开了这支企图隐藏踪迹的“恶魔”的神秘面纱

- ① 日本陆军兽医学校细菌培养教学现场。
② 在伯力审判上的日本战犯。
③ 昭和20年(1945年)春拍摄的日军第100部队本部大楼。
④ 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资料照片

第一八七七号”的文件格外醒目。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龙告诉记者，这份文件是关东军司令部向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提请任命高岛一雄等人从事军用细菌研究的文件，即“军用细菌研究从业者命令”。经日本陆军省批准，陆军兽医大佐高岛一雄等18人在日军第100部队中从事“军用细菌”研究。这彻底打开了“恶魔”的牢笼”。赵士见整理平壤全作等战犯的受审记录证实，当时的第100部队长官若松有次郎于部队内部训话“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时，第100部队应当成为大量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这标志着第100部队正式走向了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赵士见说。

为了实现防疫和准备细菌战的目的，第100部队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由部队司令部、总务部和业务部门构成。业务部门按照职能划分为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二部是第100部队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原有五个分部。1943年12月，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视察第100部队后，命令组建第六分部，专门负责细菌战所用细菌武器的生产与特殊保存事宜。

除了本部机构外，第100部队还在大连设立了出张所(日语“办事处”之意)，负责军马检疫及细菌菌液的供应，在牡丹江设立支厂配合试验活动。根据伪满皇宫博物院2018年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征集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留守名簿》显示，其部队规模最大时达900多人，魔爪伸向了整个东北地区。

罪恶滔天

与731部队假借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相似，第100部队的罪恶行径被掩盖得更加冠冕堂皇，其一直打着军马防疫的幌子来掩盖收集、研究和生产军用细菌的真实目的。吉林省博物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赵长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第100部队的相关研究，通过多年来搜集到的一系列证据，逐渐揭开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

赵长聆介绍，为了尽早研究，制造出对动物、植物进行细菌战的细菌武器，第100部队在名为临时病马收容所时，就有意识地在东北各地收集强毒菌苗，其中尤以炭疽菌、鼻疽菌为主。“这两种疫病具有较强的动物交叉感染特性，并且发病快、致死率高。这两种烈性致病菌不仅成为第100部队防疫的重心，也是日后该部队实施细菌战的要点。”

为了加快军用细菌的研究，第100部队利用大量动物进行实验。“据战后调查推算，第100部队当时每年繁育、获得的鼠、兔、马等实验动物达几万只(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掠夺自无辜的百姓。”赵长聆说。

为了检验细菌效能，第100部队还秘密进行了丧心病狂的人体活体实验。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彭超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在伯力审判后对第100部队的遗址进行了实地踏查。在踏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人的骨殖和埋尸坑，由此确认了人体活体实验后埋葬尸体的场所。有档案资料记载，原第100部队队员、陆军兽医少尉藤藤敬太郎证实，1944至1945年，他曾亲眼看见把活人当作豚鼠做实验，被实验人员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

赵长聆告诉记者，2000年，他在美国现代史、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那里看到了第100部队的重要罪证资料——“A报告”和“G报告”。两份报告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人体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第54个病例接受了整整7天的炭疽芽孢感染，然后被送上解剖台。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第224号病例在死亡之前接受了4天的治疗。对它的解剖证明有器质性损伤……”“第180号病例存活了12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化作了一段段冰冷的文字。

正是基于人体实验取得的结论，细菌效能测试后，第100部队将其应用在了野外演习。1942年7月至8月，第100部队派遣村本野少佐率领30人前往“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1932年-1945年)曾设立的地区名称)”的三河地区，开展炭疽、鼻疽菌演习，即在中苏边境将炭疽菌播撒在苏军必经的河流、草场、岸边土壤等处，一旦有人感染，就有可能在中苏官兵和牲畜中大规模扩散。

第100部队也开足了马力进行细菌武器的生产，赵士见在史料中查到，高桥隆笃在1943年底亲自向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报告，“第100部队每年生产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生产规模虽然不及731部队，但其破坏力不遑多让。

真相不湮

与731部队的广为人知不同，第100部队的罪证险些被掩盖在历史的角落当中。“日本战败前夕，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司令部提前将所有有关第100部队的资料、器材全部销毁或带走，部队内实验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赵士见说。在战后长春市进行调查的资料中，曾在第100部队担任过车夫的市民王均说，当时他看到部队办公室门前

有人用汽油烧毁大量照片，烧了一夜还未烧完，很明显是在毁灭证据。

在战后的审判上，第100部队的罪恶也一度被掩盖。彭超梳理史料发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同盟国名义占领日本，并组成了一个以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为团长的科学家调查团，先后三次对日本细菌战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了《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和《费尔报告》。这些报告加上不断寄往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控诉信，充分证明了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中，曾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的罪恶事实。

然而，这些调查成果并没有成为控诉第100部队的罪证。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菊池齐等战犯或是被安排口供，或是不交出战后审判，致使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进行审判。

直到1949年12月底的伯力审判，才第一次面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对第100部队的罪行进行调查中，通过拍照、采访知情人掌握了一系列资料。一些曾在第100部队当劳工的群众也用自己的经历还原了这支“恶魔部队”的罪恶行径。这对伯力审判供述材料形成了极大补充，也证实了第100部队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准备并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遗憾的是，残暴的侵略者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第100部队大部分人都战后回到日本，其中除了有个别人主动揭发了第100部队曾进行人体实验等罪行外，大部分人选择隐瞒了这段历史。有些人在回国后甚至成了日本军医学界的知名人物。”彭超说。

真相不能湮灭。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由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题研究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欣慰的研究成果。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文物，并进行分类、编排，建起了一座以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罪证陈列为主题的展览馆，将第100部队违反国际公约、蓄谋实施细菌战的历史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路东侧，葱茏的树木间，一座外表斑驳的烟囱静静伫立，这座第100部队遗留下来的唯一可见的地上建筑已被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其基础上建起了遗址园，供后人瞻仰铭记。

“无论是731部队还是100部队，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都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说：“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研究和展览，将那段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种境界和情怀难道不是与先贤们的精神魂魄血脉相传吗？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古今，映照未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内蒙古百年的历史真正是风云际会、波澜壮阔、撼人心魄，特别是自治区成立这73年来的沧桑巨变，更是令人瞩目。占义的这部著作，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这段辉煌的历史，它让读者从历史资料中，不辞辛劳地剪报成册。我参观过他创办的内蒙古史料博物馆，看到他精心收藏的数千册内蒙古历史资料，我深受触动、感慨万千。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占义为什么能够坚持？我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心恋故土的炽热之情，感受到这位内蒙古汉子对家乡广袤大地的深深眷恋，对故乡翻天覆地的欣喜与自豪。这

本报记者张博宇

“731”是公众对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简称，这串数字代表着一支罪恶滔天的“恶魔”部队，也铭刻着一段为全人类带来伤痛的记忆。但鲜有人知的是，731部队还有一个“孪生兄弟”——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一样的包藏祸心，一样的罪恶滔天，一样的试图掩盖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庭上，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技术骨干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战犯供认了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以下简称第100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制与量产，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揭开了这支企图隐藏踪迹的“恶魔”的神秘面纱。

恶魔兄弟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调集军马迅速向中国东北腹地扩张。为了应对东北战场马疫频发的态势，1931年9月20日，关东军兽医部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临时病马收容所，负责战时军马检验和收治工作，即第100部队的前身。次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设立了东乡部队，为731部队的前身。两支部队不仅成立时间基本一致，隶属关系上也都直属关东军司令部，而最终主导权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人员赵士见梳理相关资料发现，第100部队建立后经历了数次改编和搬迁，其职能也逐渐由收集与研究强毒菌苗向研制和生产供战争使用的细菌武器转变。赵士见介绍，1933年2月15日，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并将厂址由奉天(今沈阳)迁至“新京”(今长春)。部队内的机构与人员也得到加强。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省建议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强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并成为细菌战对策研究机关。经日本陆军省批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开始改编。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陆军省同时向天皇上奏“部队改编完成”。至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至1940年，日军出于保密考虑，对侵华各路日军编设秘密的“通称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分别获得了“满第100”“满第731”的秘密番号。

在位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罪证陈列馆里，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档案扫描件被封存在橱窗里。其中一份名为“关参一发

书话

鉴往知今，深情回望内蒙古73年奋进史



廉素

近日，我的老友、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原副社长王占义赠我一本他主编的《内蒙古历史上的今天》，拜读之余，感慨万分。

古今之人修史，不外乎有恢宏的断代史、缜密的编年史、灵动的纪传体、新奇的轶事记闻等。占义此书则另辟蹊径，选取“今天”这个时间点，犹如串珍珠一般，记载了内蒙古百年来发生在“今天”的大事要事，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别有興味。

撰史需要长期积累和艰苦付出，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忍辱负重、呕心沥血，穷尽毕生精力创作了《史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宋

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耗时19年，主持编修了《资治通鉴》，梁启超先生盛赞“亦天地一大文也”。

今天，占义用30年的持久热情和不解追求成就了这部著作，虽无法比肩上述两部皇皇巨著，但他那股执着和勤奋的精神，却与前辈先贤一脉相承。据我所知，占义从青年时代就跑遍报亭、书摊，犹如剪报搜集有关内蒙古的历史资料，不辞辛劳地剪报成册。我参观过他创办的内蒙古史料博物馆，看到他精心收藏的数千册内蒙古历史资料，我深受触动、感慨万千。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占义为什么能够坚持？我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心恋故土的炽热之情，感受到这位内蒙古汉子对家乡广袤大地的深深眷恋，对故乡翻天覆地的欣喜与自豪。这

种境界和情怀难道不是与先贤们的精神魂魄血脉相传吗？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古今，映照未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内蒙古百年的历史真正是风云际会、波澜壮阔、撼人心魄，特别是自治区成立这73年来的沧桑巨变，更是令人瞩目。占义的这部著作，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这段辉煌的历史，它让读者从历史资料中，不辞辛劳地剪报成册。我参观过他创办的内蒙古史料博物馆，看到他精心收藏的数千册内蒙古历史资料，我深受触动、感慨万千。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做一件事。占义为什么能够坚持？我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心恋故土的炽热之情，感受到这位内蒙古汉子对家乡广袤大地的深深眷恋，对故乡翻天覆地的欣喜与自豪。这